

# 马克思对生态问题根源判定的理论超越及当代意义

刘 洋 李燕芳

**摘 要** 生态问题越发严重引起了人们对生态问题根源的关注。文化观念论、经济活动论和经济制度论众说纷纭，但由于其缺乏深层性、系统性与历史性，致使理论界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未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生态治理。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坚持“实践辩证法”与“历史生成论”的有机统一，在聚焦历史实践、跳出历史具体、坚持历史生成中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生态问题的本质呈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承载力之间的张力。在当代语境，把握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说就是要将其转化为全球生态问题的治理基础、治理原则、治理方式与治理目标，以回应形形色色的西方生态思潮，消解西方生态话语霸权，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将人类推向生态文明。

**关键词** 生态问题根源 马克思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A811；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851X（2023）03 - 0029 - 12

生态问题与人类工业文明相伴而生。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工业化的飞跃致使生态危机加剧，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引起人类的广泛关注。从《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开始，世界各国的政府人员、思想理论家、科学家、环保主义者努力寻求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生态失衡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治理，部分地区甚至每况愈下。为何人类在解决生态问题上举步维艰、收效甚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至今未能真正弄清生态问题的根源，从而未能进行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的治理。当下关于生态问题根源的阐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在各种理论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的自由问题研究”（批准号：21FKSB007）；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发展支持计划（批准号：2020BJ16）。

【作者简介】刘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200433；李燕芳，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锋中探求到根源性的答案，不仅能厘清各种理论纷争的实质，还能为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启发。

## 一、生态问题根源纷争：文化观念、经济活动还是经济制度

关于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文化观念论者认为生态问题源于文化观念的偏差，要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思想文化批判；经济活动论者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类生产活动造成的，要对生产、资本等经济活动要素加以整治；经济制度论者认为生态问题与经济制度直接挂钩，制度因素才是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源。从争论中可以看出，解决生态问题确已成为社会共识，但究竟生态问题根源何处、如何破解仍莫衷一是，需作进一步探究。

### （一）文化观念论：人类中心与科技至上的问题

在文化观念论者看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文化观念论者认为人类的错误认知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通过调节“自然价值意识”与“人类生存意识”的关系来缓解人地矛盾。在他们看来，引发生态问题的人类错误意识观念很多，其中主要是以主观意识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以客观现实为基点的科技至上主义。但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者强调以人类为中心的错误观点造成了对自然的剥削，而科技至上主义的批评者认为人类对科技的无限崇拜导致了生态灾难。

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者认为，以人类为中心意味着人的利益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资源被视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库。将“自然价值”和“自然经济价值”等同起来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而引发生态问题。White（1996）在其著作里谈到，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家们倡导“弱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主义”，并将其具体化。如史怀泽（1995）提出以“敬畏生命”的原则构建生态伦理学；辛格（1994）要将人类的平等原则扩展到自然界各个物种；科尔曼（2002）要“重新构建一套视野宽广、重视生命的社会价值观”以支撑“生态可持续的技术发展”。

在科技至上主义的批判者看来，现代社会中科技已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人们心甘情愿地称科学为现代性的宗教（莫斯科维奇，2005），但人们越是相信这种宗教越会带来生态灾难。一方面，他们所崇拜的科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足以将整个地球生命及地球本身摧毁；另一方面，他们相信科技能缓解、消除生态危机亦是无稽之谈，“人们不能采用导致危机的手段来解决危机”（莫斯科维奇，2005）。因而，科技至上主义的批判者提出：“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康芒纳，1997）为应对科技至上主义带来的生态问题，思想家们提出了“绿色科技”的理念，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誓言》，作出不再参与具有生态干扰性科技活动的承诺。莫斯科维奇（2005）提到：“过去，人们为科

学的自由而斗争，今天，他们应当奋起限制科学的权力。”“绿色科技”是对科学技术负责，更是对人类与整个地球负责，是科技进步的未来。

## （二）经济活动论：生产与资本的异议

不同于文化观念论将生态问题根源的视野局限于社会意识领域，夸大主观意识作用，经济活动论更强调社会物质力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经济活动论者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社会文化领域，社会文化衍生于社会经济，应该遭到批判的是突显经济理性、具有实证主义倾向、支配自然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然而，虽都赞成从社会经济出发解答生态问题，但究竟何种经济活动因素才是根源，学者们也未达成共识，具有代表性的有“生产说”与“资本说”。

“生产说”认为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特别是现代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增多，对自然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大。奥康纳（2003）引入“生产条件”这一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以能源为基础，而且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在缓解生产与生态的张力上，有研究者提出要依据生态原则对生产技术进行重新设计，要“根据最终的产品的有效使用价值来控制生产”（康芒纳，1997）。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进一步扩大生产才能解决问题，因为生产与生态的关系呈库兹涅茨曲线变化，当生产发展达到某个“拐点”后，环境质量会随之逐渐得到改善。因而他们坚信，从长远来看，与人类基本的物质福利相关的环境和经济在未来将会得到改善（Simon，1998）。

有别于“生产说”，“资本说”认为现代生产背后的动力是资本，资本与生俱来的效用法则和增殖法则、生产强制逻辑和消费强制逻辑具有天然的反生态性。因此，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本才是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Gorz（1980）认为，资本家追求资本积累的经济理性造成的生态理性缺失，必然会引发全球生态环境的灾难性毁灭。阿格尔（1991）从资本逐利造成生产与消费异化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维护其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就是向大众不断提供各类商品，这与有限生态系统相矛盾而导致生态危机。Craig（2017）从资本的增殖本性出发，提出“社会生态关系枯竭”的概念。在生态问题的解决办法上，他们认为“生产说”强调的新观念、新模式和新科技等举措，只能是“治疗”危机，而不能“治愈”危机，更不能从根源上消除危机。解决问题必须打破资本集中，如阿格尔（1991）提出“非官僚化”和“分散化”两个方向，以打破资本集中型的生产管理体制，扭转生产与消费的异化，消除资本对生态的宰制。

## （三）经济制度论：公有与私有的争论

经济活动论认为是生产或资本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根本性破坏，将分析问题的视野从人的意识重新拉回至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但有学者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源于人类社会内部，源于社会制度（Eckersley，1992），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比起经济活动层面，更应关注经济活动背后的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论内部，学者们所持的态度也不同，既有对公有制产生的“公地悲剧”的指责，又有对私有制造成生态无限侵蚀的批判。

对生态问题从公有制根源角度进行批判,最早见于美国学者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公地的悲剧》一文。它解释了由于公共资源所有权的模糊,导致人们肆无忌惮地攫取公共自然资源,最终导致自然环境的崩溃,从而论证了“公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有毁灭”(哈丁,2001)。Merrill(2004)从公有制下产权的模糊性进行分析,认为外在环境问题正是公有制下环境责任的不明确以及环保回报的动力缺乏造成的。布坎南对公有制下资源的配置效率加以透视,认为公有制下每个人“最大限度地依赖于他人的决定”(布坎南,2002),由此导致社会对环境公共品的调控缺乏准确性与高效性,从而难以在自然资源配置与公共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对于生态问题的化解,部分学者强调要以环境要素的私有化为路径。他们认为,“集体财产是通往贫困的道路,而私人财产是通往繁荣的道路”(Angus,2010),自然资源私有化具有“财富效应”、“资本效应”和“责任效应”(Merrill,2004),主张“通过私人产权或其他类似的关系可以避免公地悲剧性地成为一个公共的污染池”(哈丁,2001)。

但在私有制根源说的提倡者看来,自然资源私有化非但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良方,反而“把自然生态世界的一切组成要素置换成可在市场上交易的私人商品,诸如水、森林、植物甚至大气本身”(Foster,2004),导致自然共同体被私人剥削,成为生态问题的根本病源。学者们对私有制与生态问题的矛盾分析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将私有制发挥得淋漓尽致。Foster(2007)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被切断,打破了自然本身及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的循环,从而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导致了“新陈代谢断裂式”的生态危机。学者们也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全球生态系统的侵蚀,布兰德和威森(2019)提出“帝国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关联。在解决措施上,他们想通过强权政府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公共控制,如佩珀(2005)提出:“这最后一个要求将包含依据生态社会主义的按需而不是按利润进行的资源开发与分配的一些世界范围内的交换和交流。”甚至有学者认为只有走向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如奥康纳(2003)表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解决生态危机,不可能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从而主张将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

文化观念论将生态问题视作错误社会意识的产物,强调生态环境保护需要人类意识的变革,有助于人们更正自身错误的自然价值观,但其难以洞察现实物质力量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在解决途径上也只是寄希望于人性的自我复归与道德观念的重塑。经济活动论认为生态问题并非发端于意识领域,资本、生产等经济活动因素才是引发危机的毒瘤,但其只涉及社会经济运转层面,未触及历史深层维度,只是一种庸俗的唯物论。经济制度论洞穿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从更为深层的所有制层面分析生态问题,但未能对生态问题作出一种系统完整的深源性查究。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我们科学认识生态问题的根源提供了更为根本、系统的理论思路。

## 二、回到马克思：生态问题根源判定的理论超越与科学解答

当前对于生态问题的见解众说纷纭，正如奥康纳（2003）提到：“其文献之多超过了一个人一生所能阅读和吸收的限度”，但仍然缺少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有力解答。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回归到一种根源性、系统性、历史性的批判中去。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洞察之所以能达至历史本质维度，是因为他站在历史唯物论的高度审视这一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天然地被认为可作为一个理解人类自然和历史的生态学方法建议”（Benton, 1989）。故要讨论马克思关于生态问题根源的揭示，应先把握其方法论基础，如此才能沿着马克思的理路追寻问题，明晰马克思思想理论的超越之处，从而科学地阐明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根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揭示坚持了“实践辩证法”与“历史生成论”的有机统一，在聚焦历史实践、跳出历史具体、坚持历史生成中厘清了生态问题的根源。

一是聚焦历史实践，突破生态问题根源探寻的观念论层面，以现实生产实践活动为基点理解问题。文化观念论者虽然已经实现从自然观与历史观统一的立场回答生态问题的根源，试图从人出发来解释世界，但仍停留在人的欲望、观念等意识层面，忽视了对精神要素产生根据的进一步阐释，无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马克思曾旗帜鲜明地与观念论划清界限，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时，他提到：“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sup>①</sup> 故在生态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的关系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从生产开始的”<sup>②</sup>。也就是说，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马克思坚持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理解问题。在他看来，生态问题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张力关系，这里的自然显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改造的人的现实与作品，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sup>③</sup>。故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必须要回到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摒弃哲学世界观和文化价值观层面的纠葛。

二是回归历史本质，突破生态问题根源探寻的经济活动或经济制度的单一层面，深入到系统性、深层性的生产方式维度观察问题。对生态问题根源剖析必须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但不能沉浸于繁复的具体历史实践活动，仅从生产力的经济活动层面分析问题难以达至根源。同样，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角度认知生态问题根源虽跳出了具体生产实践，但缺乏系统辩证性，只看到人在改造自然活动中结成的关系，未意识到生产关系离不开物，“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sup>④</sup>。马克思在深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

性、系统性的高度提出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理解生态问题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的一定的能动的关系”<sup>①</sup>,而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sup>②</sup>。这表明在人类能动作用于自然的实践中,生产方式居于本质的基础性地位,它是生产实践与社会关系的辩证统一,因而马克思能够站在历史本质的高度揭示生态问题的根源。

三是坚持历史生成,破除生态问题根源探寻的抽象厘定与本质主义思维,以历史性思维将答案锚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从具体历史实践出发,跳出历史细节进入其背后的生产方式来认识生态问题的根源。但同时马克思也意识到对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间关系的讨论,不能是抽象的厘定,并不是所有生产方式都引发生态问题,必须融入历史性思维,聚焦其历史起源与生成。在他看来,“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sup>③</sup>。所以探寻生态问题的根源要看到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间关系的历史变迁,这是马克思思考生态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思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中,“自然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历史的自然”(与人交融的自然变革过程)统一生成,两者的矛盾性剧变起源于工业社会,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问题是物性化自然问题与社会化政治问题的统一。

从以上三点方法论原则可以看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将生态问题根源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态问题的本质呈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承载力之间的张力,这是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实现的理论超越。历史唯物主义所涉猎的基本范畴,就生产方式而言既包含生产力又包含生产关系,二者统一于一体。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代表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代表生产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与地球生态系统承载力间存在巨大张力,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sup>④</sup>,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具有极大的反生态性。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力融入科技要素,对“自然力的征服”空前绝后。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在征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sup>⑤</sup>。实际上,任何形式的生产活动,都是个人劳动实践的总和,这种借助一定形式的劳动实践都将展开对自然的占有。那为何资本主义生产力会引发生态危机?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使科技成为生产力的要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 and 广泛地加以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sup>①</sup>。科技融入生产力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呈现指数级增长，这不仅带来了自然力的征服，也“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sup>②</sup>。可见，科技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指数级增长，使其对“自然力的征服”也达到顶峰，生态问题亦是指数级增长。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控于资本逻辑，使生态系统出现“物质变换断裂”。生态危机不仅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科技大生产，还与其生产关系紧密相连。“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sup>③</sup>。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核，资本的反生态性根源于资本逻辑，也就是说它所展现出的增殖逻辑与权力逻辑影响着全球生态系统。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需要以有限的自然资源尽可能多地压榨剩余劳动。实现资本增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但生产过程不是对劳动力的纯粹榨取，而是要包含具象化的物的内容，即让剩余劳动与自然生产资料充分结合。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生成经济权力，以经济理性为自然重新立法。这就使得资本不单单局限于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也具象化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资本的权力场域中，事物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必须接受资本的评判，自然的重要作用不在于它是人的无机身体，而在于是否能够成为“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和“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sup>④</sup>。在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权力逻辑的双重作用下，资本主义以一种加速的、无限的、失控的方式侵吞、透支着自然。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通过资本的输出和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操控，资本主义把全世界都卷进了其过度开发—过度消耗—过度浪费的增长动力学之中。这看似可以获得巨大效益，但对自然保护的忽视最终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以及人类生存发展条件的恶化。鉴于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以牺牲自然而实现的无限积累认定为一种“恶无限性”。

最后，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sup>⑤</sup>。在马克思看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sup>⑥</sup>。这种变革一方面是由科技应用的价值回归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进。马克思曾提到过，科技进步不仅可以实现“生产条件的节约”，还可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能让“废料……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还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sup>①</sup>。因此，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其造福于人而非资本增殖，从而通过消耗最小的自然力量供应人类世代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生态危机的克服还要彻底变革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逻辑的增殖本性使整个社会易处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生产过剩中浪费生态资源、加剧环境污染，而其根植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故要想消除这种失序状态，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以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的公有制形式取而代之。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人们将在全体社会成员的真实、合理需要下展开有计划的自觉联合生产，“生产和交往的组织……仅限于需要本身的一切需要的满足”<sup>②</sup>。由此，既满足了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又维持了生态平衡，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③</sup>。实际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最终要达到的是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那时人们开始以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为生产而生产的利润动机不复存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将达到动态平衡与和谐。

### 三、当代镜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说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高度，通过聚焦历史实践、回归历史本质与坚持历史生成，层层递进，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生态问题的真正根源，回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承载力之间何以具有内在张力，以及如何突破这一矛盾。在当代语境下，深入理解与创新践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要科学把握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进一步阐明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说的当代性，以回应形形色色的西方绿色思潮的诘难；二是如何超越当代西方生态理论的话语霸权，科学划定当代生态危机的治理责任与义务；三是如何构建生态化的生产方式，以真正化解全球生态危机；四是如何在推动生产方式转型中打造“地球生命共同体”，将全球推向生态文明发展的新境界。这四个问题分别从治理基础、治理原则、治理方式、治理目标上提出了目前生态领域亟需回应与解决的问题，必须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说的当代意义进行充分挖掘，以深刻回应这些时代课题。

第一，必须依据时代条件创新阐发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说，以重新审视当代形形色色的生态思潮，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当前生态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面对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灾害频发等问题，理论界产生了诸如“深绿”“浅绿”“红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1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绿”等形形色色的生态思潮。这些理论不仅不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反而对这一思想基础加以抨击，如把它当作一种与生态思维相对立的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不能作为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理论工具。面对这些诘难，要不断创新阐释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说，以回应生态思潮，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要对作为思想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创新性研究。在对当代生态问题的反观中进一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明晰其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统一、历史本质与历史生成结合、自然解放与人类解放协同等方法论意义，并以此阐明生命哲学、大地伦理学、浅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学说未能真正揭示生态问题根源。另一方面，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代新变化加以阐释分析。在生产力维度要看到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变化，在生产关系维度要认清所有制中国家资本所有制、法人资本所有制的崛起及劳资关系、分配关系上的资本主义新特征，要在拨开新变化、新问题、新特征的迷雾中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全球生态系统的张力。

第二，必须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说科学划定当代生态问题的责任，形成“共同但有差别”的生态治理原则。西方生态思潮在生态问题根源揭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回避，实质上透露出生态话语霸权及对生态危机治理责任的逃避。不论是从价值观角度，还是从生产过程的技术维度分析生态问题，都是在不触碰资本主义根基的情况下进行外围性的生态调适，将全球生态问题归结为一般人类活动的结果，为资本主义开脱罪名。这直接导致在生态治理实践上，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任意推脱责任，甚至将污染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如美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显然，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上世界各国必须要正确划定责任与义务，确立起相关治理原则。依据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说，在全球生态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负有主要责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环境所施加的压力以及在全球自然资源的消耗方面存在着实际差别，全球生态治理应该形成“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这就要求各国既要看到生态问题对于全球发展现实的、严峻的、长远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又要在承担共同责任的基础上，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性，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全球生态治理负主要责任。只有按照此项原则，才能体现全球生态治理的公平性，各国在生态正义中携手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三，必须构建生态化的生产方式，为全球生态问题解决提供治理手段。从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说出发，要解决当今全球生态问题必须打造生态化的生产方式，摆脱科技、资本带来的生态负面效益。一方面，要以绿色科技与绿色金融为支撑，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科技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促进生产进步的工具，但它也带来了自然生态领域的负面效应，绿色科技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宜居的协同。绿色科技的基础是构建清洁绿色低碳的技术创新体系，关键是实现技术突破，可先试点打

造零碳能源生产和智慧供能、典型行业和部门减碳脱碳关键技术、绿色低碳化学工程和可持续工业等示范科技工程，再由点及面以绿色科技推动经济发展。同时，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规约资本的增殖逻辑，但并不是要彻底消灭资本，还需发挥资本的生产要素作用，以绿色金融为动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在绿色金融打造上，要积极推进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抓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加强绿色金融制度设计，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构建生态友好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从生产关系角度，要以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与按需分配来克服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危机。但从全球现代化程度而言，完全的公有与按需分配尚不具备条件，目前要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生产资料统筹调配，社会生产有序安排，从而避免无组织、无序化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资源问题。

第四，必须在生产方式转型中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筑当代全球生态问题的治理目标。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根源说要求以共产主义确立生态化的生产方式，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要通过确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解决生态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所以当下要确立既符合长远目标也遵照当代实际的生态治理目标——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要在生产方式的转变中逐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只有这三方面同步共进才能使生态理念认知、绿色发展行动、国际交流合作协同起来，从而“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既能促进当下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又能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并以此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突出位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深刻领会“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sup>①</sup>。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塑造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实现“生态共同体”与“生态人”的统一。

## 参考文献

[法] 阿尔贝特·史怀泽(1995):《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16页。

[美] 巴里·康芒纳(1997):《封闭的循环》，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20、231页。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64页。

[加] 本·阿格尔 (1991):《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慎之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486—488、499 页。

[澳] 比特·辛格 (1994):《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江娅译, 《哲学译丛》第 5 期, 第 25—32 页。

[英] 戴维·佩珀 (2005):《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 刘颖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 356 页。

[美] 丹尼尔·科尔曼 (2002):《生态政治: 建设一个绿色社会》, 梅俊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 32 页。

[美] 加勒特·哈丁 (2001):《公地的悲剧》, [美] 戴利、汤森编;《珍惜地球: 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 马杰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第 152、154 页。

[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2005):《还自然之魅: 对生态运动的思考》, 庄晨燕、丘寅晨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 5、36、47 页。

[德] 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 (2019):《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 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 郇庆治等编译,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第 14 页。

[美] 詹姆斯·奥康纳 (2003):《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第 196、200、435 页。

[美] 詹姆斯·布坎南 (2002):《财产与自由》, 韩旭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 50 页。

Angus, I. (2010), "The Myth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Angus, I. (ed.), *The Global Fight for Climate Justice: Anticapitalist Responses to Global Warming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p. 71.

Benton, T. (1989),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178, pp. 51–86.

Craig, M. P. A. (2017), "Two Conceptualisations of Socio-ecological Crisis", in Craig, M. P. A. (ed.), *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ocio-Ecological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 11–18.

Eckersley, R. (1992),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 London: UCL Press, p. 148.

Foster, J. B. (2004), "Ecology,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 interviewed by Soron, D., *Monthly Review*, 56 (6), pp. 1–12.

Foster, J. B. (2007),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Monthly Review*, 58 (9), pp. 1–14.

Gorz, A.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gderman, P. and J. Cloud, Boston: South End Press, p. 15.

Merrill, T. W. (2004),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28 (1), pp. 69–80.

Simon, J. L. (1998), *The Ultimate Resource 2*,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6.

White Jr, L. (1996),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in Glotfelty, C. and H.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p. 6–14.

# The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Marx's Determination of Ecological Problems

LIU Yang, LI Yan-fa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s have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root causes of ecological problems. The theories of cultural idea, economic activity or economic institution are different, but because of lack of depth, systematicness and historicity, the theoretical circle has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so that ecological governance can not be carried out with a specific purpose. Standing at the heigh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insisted on the organic unity of "practical dialectics" and "theory of historical generation". In focusing on historical practice, jumping out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and insisting on historical generation, he attributed the root of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believed that the essence of ecological problems was the tension between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earth's ecosystem.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to grasp the theory of the root of Marx's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s to transform it into the governance basis, governance principles, governance methods and governance objectives of global ecological issues, so as to respond to various western ecological trends of thought, dispel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ecological discourse, solve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bring mankind in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root of ecological problems; Marx;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侯 宁